

# 经济评论

## 简 报

2011 年第 6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1 年 12 月 2 日

### 编者按

1. 经济学、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 丁晓安
2. 风险分担网络为什么是无效的? ..... 叶初升 刘亚飞
3. 当期产出、转移支付与继任博弈..... 梁松 刁莉
4. 国际技术保护——中国本土企业懒惰的借口..... 袁文榜
5. 宏观审慎政策需要持续稳定的简单规则..... 陈伟忠 黄炎龙
6. 经济区域化收益评价及其实现途径..... 戴永安 张曙霄
7. 消费者可以影响企业的环保行为吗? ..... 邓德军 肖文娟
8. 工作特征能够解释性别收入差距吗? ..... 卿石松
9. 从股东财富效应看股权再融资方式的选择..... 邹斌 章卫东 周冬华 王珏伟
10. 债务契约对不同性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李增福 曾庆意 魏下海
11. 房地产市场中外外部性理论的新案例和新发展..... 白钦先 主父海英
12. 变化始于人口..... 徐盛发 巴曙松
13. 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 APEC 地区经济增长..... 刘玉海 武鹏
14. 发展中国家永远不承担强制减排责任吗? ..... 史亚东
15.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研究新进展..... 陈继勇 梁柱
16. 大国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欧阳晓
17. 产权保护：理解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钥匙..... 曾祥炎 林木西
18. 西方经济伦理研究中的数理方法..... 沈昊驹 乔洪武

### 《经济评论》简介

##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向《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报刊以及网站经济频道等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 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 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 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體，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 经济理论探索

### 1. 经济学、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

丁晓安（广西财经学院）

《经济学视域下的公共政策分析：批判与反思》，《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经说过，“世界大多数人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因而，经济学理所当然是“经世济民”的学问，而解决贫困、为绝大多数底层的劳苦大众服务，也就应当成为经济学者应有的、最起码的良知和觉悟，且更应当成为经济学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终极价值目标。作为当代经济学奠基人和鼻祖的亚当·斯密在鸿篇巨著《国富论》中就写到：“当绝大部分的社会成员处于贫穷和困苦时，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确实兴旺发达和美好”。

但是，令人多少有点遗憾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失败的因素越来越多，尤其是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步入到几乎“1%和99%”的格局时，经济学对于公共政策的分析，还是基于其在微观领域的效率标准，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进行了稍作拓展性的移植。不仅如此，现在大多数的经济学分析，似乎越来越偏离了经济学的本质和真谛，即解释世界或解释人类行为，忽略了现实世界与人类社会许多无法直接观察和度量的属于人的主观或心理感受的变量，开始运用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数理分析。结果是，经济学的数学方程与模型现状日益复杂化，让人眼花缭乱，得出的结论却是简单而鲜存新意，开始给人以一种经济学已经成为穷于言表之人摆弄的装饰品的感觉，成为“沉闷的社会科学的皇后”。

人作为非鲁宾逊世界的社会性个体，所追求的不应该仅仅是孤立的效用最大化目标，而应该是角色意义上的目标及其协调。政府公共政策下的集体行动则恰恰是对目标协调的表现和结果。因此，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首先应该是目标的选择与一致认可，然后才是对达成该目标的技术、手段和工具的选择，即现代主流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计算及其“效率”。可见，公共政策首先且更为重要的是公平问题，是对“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价值判断问题。从而，在分析中，就必然要涉及到人类行为的三个基本方面：伦理、经济和法律。作为行为的准则，它们都起因于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并因为实现利益的资源的稀缺性而成为必要。其中，伦理准则主要是以集体唾弃为特征的道德制裁来执行；经济准则主要是以带来财务损益的集体制裁来执行；而法律准则主要是以有组织的（由国家和政府保障的）集体暴力制裁来执行。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经济准则代表了伦理和法律准则在普遍存在的经济行为中的应用，也就是说经济行为本身也具有非经济（即伦理和法律）的含义。伦理准则提供了认知基础，法律准则则提供了关于规则的详细说明和最终的执行。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只有在伦理和法律准则被参数化了的空

反观现在主流经济学关于公共政策的分析，却同时是结果主义的和福利主义的，是基于人们所关注的制度变化的抽象效率的判断，尤其是计量、数理回归分析更是建立在对效率机制的机械原因的探讨上、基于现在对未来做出的评价上。

经济学家，肩负着经世济民的重任，相比其他领域的学者，更要多下一重功夫，要在明白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用规范来指导实际，直到推导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为止，从而让现实从不合理朝着合理的方向迈进，让合理的更加优化。所以，在研究过程中，经济学家必须严格遵照特定时期的特定局限条件，方能得出可以被事实所验证的结论并发现其中的可能被遵循的规律性。

## 2. 风险分担网络为什么是无效的？

叶初升 刘亚飞（武汉大学）

《非正式风险分担网络的完备性与效率——一种计算经济学的 ABM 仿真研究》，《经济评论》2011 年第 6 期

经济学家舒尔茨说，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是贫穷的，因此如果我们理解了致贫的经济学，那么我们就理解了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早期的贫困研究将贫困看作收入或支出的不足，这种贫困视角是一种对贫困问题的事后评价，因此，无助于贫困的预警和预防。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贫困的理解愈发深刻。贫困不仅仅意味着当前的清贫生活状态，更意味着抵御未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一个家户也许当前的生活状况并不算太糟糕，但是如果其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弱，那么它就有随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因此，欲研究和缓解贫困，就必须关注穷人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应对风险的能力。

穷人应对风险冲击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多样化收入来源、变卖资产等等。但是这些风险应对策略的效果是有限的，毕竟，即便是富人尚需要借助保险市场来分担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何况资源匮乏的穷人？然而，在穷人生活的落后农村地区，正规的保险市场并不存在，因此，穷人只好通过非正规的风险分担网络来彼此分担风险。

所谓风险分担网络，是指穷人与亲戚朋友建立的互帮互助关系，风险分担的具体形式包括非正式信贷、实物帮助、货币收入转移等等。自从詹姆斯·斯科特最早注意到了东南亚农民之间的非正式保险，非正式风险分担网络已经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对于非正式风险分担网络方面的文献主要是对已经形成的既定网络进行实证研究，对网络的效率和完备性进行评价。目前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是，风险分担网络往往是不完备的、无效率的。

显然，风险分担网络所联系的家户数量越多，风险分担网络越完备，风险分担也就越充分。但是为什么家户之间不能形成一个完备的风险网络呢？是什么因素导致某些家户没有联系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建立风险分担关系需要成本，包括监督成本、维系关系的成本等等。比如，你把钱借给了自己的邻居，但是你可能对他并不放心，担心邻居可能会还不起借款。因此你可能会无意间地对邻居如何利用这笔贷款进行监督，由此引发的成本就是监督成

本；此外，双方的关系一旦形成，还需要投入维系成本，这是因为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资本，也会发生折旧。通俗地说，亲戚朋友之间要相互走动，否则时间久了就会生疏。为了弥补社会关系的折旧而付出的成本就是维系成本。

风险分担关系的收益在于其能够提供风险分担的职能，因此能够使风险分担关系的双方获得更大的期望效用。在决定是否建立风险分担关系时，当事主体就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就建立风险分担关系，否则就不建立风险分担关系，甚至切断原来的风险分担关系。

风险分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具有外部性。比如，A 和 B 之间存在风险分担关系，此时 C 如果与 B 建立风险分担关系，假设资源的流动是无摩擦的，那么 C 也就间接地能够与 A 进行风险分担。换句话说，C 与 B 建立风险分担关系为 A 带来了正外部性，但是 A 并不需要承担建立和维系该风险分担关系的成本，成本和收益的错位就会导致网络的无效率。欲消除无效率，就必须消除外部性，或者将外部性内部化，这可以通过让外部性的受益者分担成本来实现。一旦将外部性内部化，成本和收益的错位就会消失，就会形成更加完备、有效的网络，风险分担的范围也就越广。

### 3. 当期产出、转移支付与继任博弈

梁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刁莉（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1 年第 6 期

在任何类型的组织中，某一职位现任者的活动都会受到前任贡献（转移支付）或“财富”的影响，同时现任者也需要考虑给他的继任者留下多少贡献或财富。前后任之间的决策会对组织的总体利益产生影响。在任者决定给继任者留下贡献的多少，会影响在任者在职期间做出贡献的方式以及总贡献的大小；由于继任者对于前任留下的贡献财富的处理态度和前任可能不同，这将影响每一任的决策和行动。这种前任、后任相互影响的决策行为就是继任博弈。它主要分析在任者什么情况下更关注当期产出，在什么情况下更关注对下一期的贡献，如何协调个人收益和组织总体利益以及参与人之间特殊关系对继任活动的影响等。这些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在任何组织机构，都存在组织领导或者管理人员继任的问题。即使是很多普通职位也存在具体负责该项职责的组织成员离开并需要新人继任该项职责。继任是保证组织继续发展和实现组织功能的必要条件。继任博弈的思想源于遗产博弈和家庭中代际转移支付相关的问题。因为在任者留给下一任的贡献类似于一种“遗产”或者“礼物”，而且家族企业中的继任博弈和家庭内部的遗产博弈的某些结论存在相关性。

通常情况下，继任博弈存在一个转移支付比例为常数的均衡状态。在特殊情况下，每个参与人的个人总贡献相等。如果遗留贡献在下任期间影响更大，则贡献留下的比例将更高，决策或者政策的延续性更强。如果有在任者愿意留下更多的贡献则对他人和组织发展有利。

但实际博弈均衡的实现条件通常存在个人和组织最大化目标的不一致。因此，个人和组织之间存在矛盾是继任博弈的常态，导致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背离。如发生短视行为，使

参与者在任期内更愿意关注短期利益的行动,而对于能够给组织带来长期利益的行动实施不力。这是很多组织中十分常见的问题,比如导致出现“政绩工程”。有时,在任者甚至会为了个人利益而给继任者留下负的贡献,比如官员贪腐造成恶劣影响等。

如果在任者留下的部分贡献无法获得相应的短期回报,则参与人会尽可能少地提供这些贡献。这将导致在组织中一些公益性的贡献较少,甚至自愿留下的部分也会减少。能力越强的在任者留给下一任的贡献越多,则在任者也愿意留下更多的贡献,但在任必须具备能力较强且愿意延续自己的贡献。一个组织中,能够将前一任的贡献继续发扬的继任者对组织也更加适合。

当某在任者和继任者存在特殊关系时,如家人、朋友、同学、师生、同乡等构成的组织,继任博弈有不同的特征。此时可能会出现任者对地位越低越近的继任者提供越多的支持。这可能导致继任者缺乏动力,对组织不积极管理。相反,即使某些人能力很强,也可能因为关系的疏远而无法获得较多的支持,而这有悖于组织的总体利益。当存在特殊关系时在任者对继任者能力要求也会降低。只有当特殊关系的人能力严重不足时,才会考虑由外部人继任。

继任博弈可以运用到分析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协会团体、公益组织和企业单位中继任相关的问题。继任博弈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还可以运用到分析政权更迭(如人类历史上最引人关注的皇权继任)、历史文化遗产、法律制定和延续、制度变迁等方面的问题。

#### 4. 国际技术保护——中国本土企业懒惰的借口

袁文榜 (河南大学)

《基于垂直产品差异的技术转移分析》,《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理论界或实践中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中国本土企业一直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加工地位主要是因为跨国厂商对其核心技术的刻意保护。这种观点很受欢迎,一是它解释了中外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二是它使得中国本土企业安于现状,既然改变不了现实,那就接受现实。这种观点听起来很合理,技术创新是获取超额利润的主要方式之一,技术共享便意味着分摊利润,这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厂商来说的确是很难接受的状态。但仔细考察便发现这种观点很难站得住,暂且不论跨国厂商是否有刻意保护其核心技术的动机,单就把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的做法就值得怀疑,它不符合内因是决定因素的哲学观点,所以说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跨国厂商东道国投资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利润,技术创新只是其中的手段之一而已。总体来说,跨国厂商能否获利及获利大小取决于需求和成本两个方面,同时这两个方面是息息相关的,需求总是随着成本递减。东道国的需求环境是跨国厂商的不可控因素,可控的只有自身的生产条件,这就要求跨国厂商必须将生产条件适应东道国的需求环境。比如当东道国消费者消费能力很低时,跨国厂商就只能转移被淘汰的落后技术,因为这些技术都是一些成熟技术,使用该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和成本都很低,能够满足低收入消费者需求,

而在高收入发达国家没有需求。随着东道国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升,跨国厂商所转移的技术水平也会逐渐提升,直至将其所掌控的最高水平的核心技术转移至东道国并在东道国开展技术研发,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厂商在中国的真实写照,从这个角度来说,跨国厂商所转移的技术水平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的整体环境,而不是出于技术保护的考虑故意转移较低的技术水平。

产品技术以物化形式投入东道国市场后便为技术外溢提供了机会,并且这种机会随着时间推移和技术成熟变得越来越大,但东道国企业能否利用这一机会则是另外一回事。首先,技术外溢并不是免费午餐,它要求东道国企业具备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即要求东道国企业加大自身科研投入。技术创新是拉大企业差距的一种手段,当市场中所有企业都进行技术创新时,只要技术创新有成本投入,均衡利润与创新前相比就会更差,即会产生“囚徒博弈”的均衡结果,长期的博弈结果就是大家都不创新,这也是中国本土企业多年来的状态。当跨国厂商带着先进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后,原先的均衡局面被打破,高端市场被跨国厂商垄断,短期内中国本土企业没有能力和跨国厂商进行技术创新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新的均衡局面是稳定的,因为此时如果中国本土企业加大科研力度,并充分利用跨国厂商的技术外溢来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时会产生两种效应:竞争效应和技术外部效应。跨国厂商的技术外部效应可以为中国本土厂商带来更大的竞争力和市场空间,但是产品差异程度的缩小会导致市场竞争的加剧,导致边际利润的降低。综合考虑,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中国本土厂商的最优选择可能就是安于现状,承认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加工地位。

中国本土企业的这种躲避策略所产生的后果是恶性循环的,它所带来的短期收益会越来越,而丧失的长期收益却越来越大。基于此,中国提出了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但这一战略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它需要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监督体系,减少中国本土企业当前的策略选择所带来的收益,加大自主创新策略的收益范围和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中国本土企业掌控国际研发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参与国际高端产业链的竞争。

## 中国经济研究

### 5. 宏观审慎政策需要持续稳定的简单规则

陈伟忠 黄炎龙（同济大学）

《最优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其福利效应分析》，《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简单规则就是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根据政策目标的变化，对政策工具进行对应的调整。这一行为规则必须是简单的，以至于人们能够根据经济发展指标的变化，准确地计算出政策工具的变化，以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打个比方，中央银行以利率规则为基础执行货币政策，当通货膨胀同比增加1%个单位，通货膨胀上升，表示资金的使用成本过低，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要维持价格水平的稳定，中央银行应提高利率，若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遵循1.5倍的响应关系，则通货膨胀增加1%个单位，利率就应提高1.5%个单位，这就是利率简单规则。同理，财政政策也具有类似关系，以支出规则为例，同比增加1%个单位，产出的增加表明经济处于扩张阶段，根据逆经济周期原理，扩张阶段政府应缩减政府支出规模，则支出与产出两者的变化之间呈现反方向变化，若支出与产出之间遵循-0.3倍的响应关系，则产出同比增加1%个单位，支出应同比减少0.3%个单位，这就是财政支出简单规则。由于财政政策具有支出和税收方向相反的两个政策工具，因此也存在税收政策规则，或者可以将两者归纳为财政政策简单规则。

首先，简单规则与社会福利标准相吻合。衡量经济发展的工具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产出，一种是福利。产出标准实际就是GDP标准，最早是库兹涅茨提出的，但随后就遭到学术界的反对，理由是GDP标准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从而，衡量标准转向社会福利，对一个政策的评价取决于政策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社会福利最大的政策就是最优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规则的理论基础就是社会福利标准。需要解释的是，社会福利标准并不是说要放弃GDP标准，像欧美一样借债消费，人们过着整天吃喝玩乐的生活，而是保持低通胀目标和适度的增长，并且经济能够长期持续稳定地增长。也就是说，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政府根据简单规则对宏观政策进行调控，最后实现低通胀目标和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GDP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带来不少问题，其中社会福利标准逐渐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近期政府部门的主动做空正是为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一种真切体现。

其次，简单规则是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工具。宏观调控历来是政府进行逆经济周期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是，宏观经济目标时刻在变化，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均先后不同程度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中国也不例外。这种宏观调控实际可纳入相机抉择政策，即灵活地根据本国经济情况对实际经济进行调节。然而，由于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相机抉择政策的过度使用将导致宏观经济发生剧烈波动，这种情况的发生，偏离了政府调控的初衷。这里，简单规则是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工具，即在没

发生重大危机事件情形之下,宏观的审慎管理可以依据简单规则执行,由于简单规则遵循了长期的连续性,政府在完善经济结构的条件下,无须对宏观经济进行过多干预,简单规则下的宏观审慎管理,企业和个人能够根据整体经济环境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修复,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生活和消费,以使得自身生活保持在最好的状态。

再次,简单规则有益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作。通货膨胀和产出是宏观政策的两大目标,但是,单一的任一政策都难以应对两种目标的变化。比如一个社会能够允许的通货膨胀是有限的,因为通货膨胀具有削弱社会福利的效应,而社会福利不仅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还受到财政政策的影响,所以,单一的货币政策即使能够控制住短期的通货膨胀,也无法控制长期的通货膨胀。这样,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合作共同应对通货膨胀,将对抑制通货膨胀产生决定性影响,而要衡量这样的合作机制,简单规则是最有效的办法。在两大目标发生变化时,根据货币政策和财政规则,政府部门就能有效地计算出财政支出和税收该怎么平衡,利率、货币供应量、存款准备金率该如何变化,两者不会发生冲突,在政策实践中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最后,简单规则能够有效管理预期。使用简单规则来衡量宏观政策,不仅有利于政策工具的准确调控,而且,由于人们能够很轻易地根据经济指标的变化计算出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从而有效地避免了预期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股市、债市、商品市场、生产企业等单位和个人,都能够依据简单的信息判断政策动向,从而进行自我选择,决定投资方向,决定生产进度,决定贸易规模,最终决定持续稳定的产出。政府也应积极地声明,政策将严格依照简单规则进行抉择,从而为市场提供稳定的预期,增强了宏观政策的稳定性,也增加了宏观经济的抗风险能力。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处于复杂的环境之中,国际国内形势都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应用简单规则,完善市场机制,稳定宏观经济预期,对于增强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6.经济区域化收益评价及其实现途径

戴永安 张曙霄(东北师范大学)

《我国三大经济区的区域化收益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经济效率的视角》,《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不断推出的区域宏观战略规划便证实了这一点,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自上而下的战略需求,也是经济发展自下而上的现实需要。理论上讲,经济区域化是指区域内若干国家协调、组织和安排经济合作或经济整合的过程和趋势,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契约或协定,促使资本、技术、劳动、信息、劳务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经济区域化的理论与实践,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城市个体层面,均出现了较多的成功经验和经典模式,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区域经济组织,还包括美国东北海岸的大都市连绵区、

英国东南部大城市连绵区、德国鲁尔大城市连绵区、日本东海道大城市连绵区等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组织。在城市经济发展实践中，即便没有成熟的契约或协定，地方政府也存在促使本地经济区域化的动力，即在更加开放的发展背景下，立足于当地优势，使本地经济融入到更大的经济区划和宏观发展战略，实现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对于经济区域化的正面影响，理论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分工协作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市场规模扩张有利于规模经济生产，竞争加剧提升了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技术升级使得生产数量大幅增长和质量大幅提高，诸如此类经济区域化的正面获益可称之为区域化收益。如何衡量各个城市参与经济区域化过程的具体收益？这是经济学界以及宏观经济管理者极为关注的问题。

基于城市经济效率视角，拜尔纳斯和斯托贝克（2000）开创性地提出了使用不同的技术前沿参照法对城市经济效率进行评价的 DEA 方法，即通过考察城市独自运行、参与区域内分工和区域间分工三种状态下的经济效率水平变化，来分析经济区域化对各个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以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区为例，通过考察各个城市的独自运行经济效率、参加区域内分工后的经济效率和参加区域间分工后的经济效率，可以得出各个城市参与经济区域化的收益水平。研究发现，珠三角地区可通过区域内分工获得较大收益，而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通过区域间分工获得的收益要比通过区域内部分工获得的收益高得多。通过区域内分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产出水平可进一步提高 10.2%、17.9%和 11.2%。通过区域间分工协作，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可分别使产出进一步提高 21.9%、0.7%和 34.6%。各类城市条件特征对经济区域化收益的实现存在潜在影响，考虑专业化分工、多样化分工、对外开放、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区域经济空间影响几个方面，研究发现，专业化分工和技术研发能力有利于区域化收益的实现，而外资的引进、政府的作用和城市外部空间影响则扩大了区域化收益，产生了区域化分工协作的现实需求，对外贸易对区域化收益的影响尚不明确。

三大经济区各城市独自运行的平均经济效率几乎处于同一水平，而通过区域内与区域间分工协作可以实现城市经济效率的大幅提高。城市参与区域化分工协作的能力决定了城市经济效率的最终水平。在保障城市自身经济良好运行和产出效率不断提升的基础上，促进区域内分工协作的重点在于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运作机制，提高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物流、信息、技术和金融等方面的支持，协调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运营和出口导向型企业与本地市场化企业的关系；而促进区域间分工的重点在于促进各区域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不同区域企业之间先进管理技术与经验的沟通，为产业与企业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提供保障。

## 7. 消费者可以影响企业的环保行为吗？

邓德军 肖文娟（广西大学），《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议题,在此背景下,企业受到的环保核查也越来越严格。但是,从企业公开披露的信息看,即使是属于同一行业如石化类的企业,在环保方面的绩效却各不相同。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既然属于同一行业,那么企业面临的监管环境应该差不多,为什么企业环保绩效却不一致,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呢?

尽管研究人员均认可政府管制、社会压力在促进企业的环保行为中的作用,然而,对于个体消费者在推动企业环保行为中的作用却存在较大争议。有人认为,确实存在强有力的消费者,他们可以对企业行为施加影响。但是,另有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找到消费者驱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证据。因为当研究人员研究消费者实际购买行为时,发现了不一样的绿色消费者,消费者的实际购买行为并不总是与其偏好一致,消费者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声称自己关心环保产品,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将自己对环保产品的偏好转化为实际的购买行为。

因此,消费者能否推动企业实施积极主动的环保行为尚不明确。但是,以往研究大多讨论企业的环保行为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并没有直接回答消费者能否推动企业实施积极主动的环保行为,而且这些研究对消费者行为的测量大都基于被调查的或者被实验的自填式问卷调查,并不能反映企业的环保行为对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决策的影响。另外,理解消费者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管制和社会压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让企业被动实施环保行为,而具有积极环保意识消费者的存在可能是企业主动实施环保行为的诱因。因此,有必要再从消费者角度探讨企业环保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随着消费者对环境保护议题的关心明显增多,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再也不能忽视环境问题。就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而言(包含环境责任),消费者通常要求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诚实、尊重客户、信息透明和勇于承担责任。消费者作为企业产品(服务)的买家和最终的使用者,完全有能力使用其影响力,他们可以拒绝购买(使用)对环保不负责任企业的产品。而且,除了直接行使自己的购买权之外,消费者也可以采用诸如在媒体抱怨、负面口碑等方式对企业间接施加影响。消费者施加影响的结果是,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如环保组织、媒体、投资者和员工)通常会与他们合作。这种直接或间接的做法让消费者可以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因此,消费者可以通过自身或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推动企业的环保行为。

从实践上看,在化工行业,有些公司生产最终产品,他们直接面对普通消费者,感受到的消费者压力相对较大,有些公司生产中间产品,其产品销售给企业,他们不必直接面对消费者,感受到的消费者压力相对较小。这两类公司的环保绩效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消费者的确可以对企业的环保行为施加压力。之所以关注化工行业,因为石化塑胶业公司生产过程和产品很特殊,对环境的污染较大,根据国家环保总局2003年发布的《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文件,这类公司较多地受到了来自国家环保法律法规的约束,因此石化塑胶业公司成为研究公司环保行为的代表性样本;而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石化塑胶业,是为了消除国家环保法规与社会压力对公司环保行为的影响。

总之,消费者可以影响企业的环保行为,企业感受到的消费者压力越大,企业的环保绩

效越好。因此，我们可以持续地、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通过扩大责任消费者的规模以及提高消费者对责任产品的偏好强度，依靠消费者的购买选择实实在在给企业施加压力，从而促进企业的环保行为。

## 8. 工作特征能够解释性别收入差距吗？

卿石松（华东师范大学）

《工作特征对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当前，收入差距，包括性别间的收入差异持续扩大，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二五”期间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努力扭转性别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既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也是男女平等国策的基本要求。为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都明确提出“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缩小男女收入差距，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性别收入差距的原因不同，其对策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理解性别收入差距的成因，对于制定性别平等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性别收入差距，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补偿性工资是解释性别收入差距成因的理论之一。按照补偿性工资理论的基本观点，工作特征对劳动者工资具有关键作用，工资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生产力特征的回报，它还包涵不合意工作特征的补偿。由于角色分工和社会偏见等，男性和女性对工作特征的偏好可能存在系统差异，例如女性倾向于选择工作时间较灵活的工作和危险程度较低的工作。因此，分析性别收入差距必须考虑工作特征差异的作用。

早在二百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五大类补偿性工资因素，包括工作难易程度、污洁和尊卑；学习掌握相关技能的难易和学费多寡；工作稳定性；工作责任大小和职业成功概率等。在此基础上，我们选取了一系列可能导致补偿性工资差异的工作特征，如职位、工作环境、工作单调性、工作自主性、体力/脑力要求、上下班时间灵活性等。研究表明，工作特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担任管理职务和从事技能工作的比例普遍高于女性，而户外/车间工作、脏活、体力劳动以及需要长时间劳动的工作更多地由男性劳动力承担，但工作内容单调的工作更多地由女性劳动力承担。从工作条件的工资回报来看，脏活、累活并没有得到工资补偿，男性上下班时间的灵活性高于女性且能够得到正的工资效应。

在性别收入差距可以解释的部分中，管理职务等工作特征对性别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纳入工作特征变量之后，性别收入差距中总的可解释部分仅提高了约6%，仍有70%左右的性别收入差距无法由人力资本和工作特征的差异进行解释。与前期研究相比，尽管我们控制了大量的工作特征变量，但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仍然得不到解释，这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歧视的有力证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提高女性

在高层管理职位上的比例。“同酬”必须“同工”，提高女性在高层职位上的比例，这本身就是性别平等的议题，而且由于女性可能更具平等观念，提高女性在高层职位的代表性，有利于更好地实施性别平等政策和减少性别偏见。(2) 完善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激励雇主提高对女性的在职培训力度。妇女因生育而中断工作，以及较男性早退休等原因，雇主可能不愿为女性提供在职培训，妇女的培训意愿也可能不高。因此，需要完善基于生理差异的保护性政策，发展公共托幼事业等与妇女发展关系密切的公共服务，减轻作为家庭主要照料者的女性的负担，努力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进程。对女性的在职培训进行鼓励和补贴，以激励雇主提高对女性的培训力度，从而为女性创造更好的晋升条件和机会。同时，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在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给予企业一定补贴等，对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进行有效的保护。(3) 完善反歧视立法、加强执法和司法的可操作性。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以及性别歧视的产生与法律缺失有关，立法分散而没有专门的《反性别歧视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就业促进法》等现有法律、法规条文过于空泛，识别和判定性别歧视没有实施细则，缺乏执法的可操作性。此外，性别歧视受害者缺乏司法救助的途径，对违法者缺乏必要的追究和处罚，是我国有关性别歧视立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立法机关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指导劳动力市场行为：一是要尽快制定专门的《反性别歧视法》；二是加强执法和司法的可操作性，对性别歧视的判定依据、举证责任和司法程序等都进行细则规定；三是要明确规定违法责任，提高法律效力。

## 9. 从股东财富效应看股权再融资方式的选择

邹斌 章卫东 周冬华 王珏伟 (江西财经大学)

《定向增发与公开增发新股融资股东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股票市场的金融资本效率配置的功能正逐步发挥。股权分置改制之前我国主要采取配股和公开增发的方式进行股权再融资，而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虽然也有公司选择公开增发进行股权再融资，但定向增发新股逐渐成为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的主流，并且定向增发的股权再融资上市公司受到投资者关注的程度更高。针对这一现象，为什么同为增发新股的股权再融资方式，定向增发更受到投资者的追捧和上市公司的青睐呢？

国外学者从股权再融资的宣告效应出发，对公开增发新股和私募发行新股的财富效应进行了研究。已有的相关研究表明，公开增发新股进行股权再融资的宣告效应为负，并且选择公开增发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从长期看股东获得的持有期收益率为负。宣告公开增发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都出现了下跌，并且公开增发给股东带来的长期累积超额收益率为负。而对与私募发行（定向增发）而言，私募发行有着正的宣告效应，宣告私募发行给股东带来正的短期财富效应，并提出了监督假说、信息不对称假说、防御假说等来解释这一现象。同时，私募发行的长期价格表现不佳也得到了众多实证证据的支持。

我国上市公司采用定向增发进行股权再融资是从 2006 年大规模兴起, 涉及到股东财富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因此, 从定向增发的股东财富效应出发来研究定向增发受到市场和上市公司追捧的原因, 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以 2006.1.1-2010.6.30 间公布增发预案并成功实施增发的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通过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 大约 14.3% 的上市公司选择了公开增发进行股权再融资, 而高达 85.7% 的样本公司选择了定向增发, 直接表明了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再融资中倾向于选择定向增发的偏好。从短期来看, 并且相对于公开增发的新股而言, 我国上市宣告定向增发新股股东能获得显著为正的股东财富效应, 而宣告公开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短期财富效应却显著为负。从长期来看, 我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新股后 1-3 年股东获得的长期超额收益率均为负, 而定向增发新股后 2 年股东获得的长期超额收益率均为正, 并且定向增发新股的长期超额收益要显著高于公开增发新股的样本, 表明定向增发再融资更能够保护投资者长期财富。

因此, 无论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 定向增发新股股权融资给股东都能够带来正的股东财富效应, 这也解释了定向增发新股得到上市公司青睐、受到投资者追捧的原因。实践中也为上市公司采取适当的股权融资方式保护投资者利益, 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实证参考。

## 10. 债务契约对不同性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李增福 曾庆意 魏下海 (华南师范大学)

《债务契约、控制人性质与盈余管理》, 《经济评论》2011 年第 6 期

关于债务契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瓦茨和齐默尔曼 (Watts and Zimmerman) 在 1986 年提出了著名的债务契约假说, 该假说认为公司的债务水平越高时, 假定其他条件相同, 经理人越有可能选择增加收入的会计方法。这样, 盈余管理就成了公司避免违背债务契约的一条途径。随后许多国外学者都对此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然而, 已有文献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债务契约假说的研究发现, 由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国有控股公司在债务契约约束下, 没有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 而非国有控股公司支持债务契约假说。值得注意的是, 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契约假说的检验都是基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研究, 而实际上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也是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是直接进行实际经济活动的操纵, 通常与正常的经济活动难以区分, 因而具有更强的隐蔽性, 同时它会改变企业正常的经济活动, 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 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净损失。而关于预算约束问题, 有研究发现, 随着我国银行业的改革, 尤其是 2003 年以来的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 对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起到了显著作用, 偿债能力低的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不断下降, 换言之, 他们受到的银行的预算约束越来越硬。因此, 我们的疑问是在债务约束下, 国有企业没有进行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 是否从事了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 而非国有企业在进行应计项目操控的同时, 是否也进行了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

目前债务融资仍然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手段。债权人贷款给企业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会提出一些限制性条款,对债务人行为进行一定的约束。当上市公司负债水平比重越大时,债权人的限制性条款就越严格,也将意味着企业违背债务契约相关条款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企业违背了债务契约的相关条款时,债权人就会依据债务契约条款对其进行惩罚,严重的将导致企业破产。因此企业契约负债水平越高时,为了避免违背债务契约(也即避免债权人的惩罚),企业(债务人)就越有动机进行盈余操控来调高盈余。

随着市场化深入所带来竞争的加强、法律环境的不断完善以及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市场化的推进导致预算软约束呈现不断渐进硬化,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但是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关注,面临着更严格的法律和监管,企业财务制度也更为健全,这意味着此类企业进行应计项目盈余操控的边际成本较高。也确有研究表明,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在应计项目操控上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更大。那么一方面国有企业面临更严厉的法律、监管和会计制度安排的约束,另一方面所有者虚位导致的股东监督较弱,管理层可能更倾向于以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替代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而非国有公司则可能会从事一定程度的应计项目操控和一定程度的真实活动操控。

我们以 A 股上市公司 2002-2009 年的数据为样本,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这一特殊制度背景,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角度考察了债务契约和控制人性质的治理效应。主要结论为:(1)总体而言,公司的负债水平越高,为了避免违背债务契约,不仅会促进应计项目操控的盈余管理,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的动机也会越强烈。(2)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采用更为隐蔽且难以识别的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而非国有控股公司会同时采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两种操控方式进行盈余管理。这一研究结论是对已有文献研究认为在债务契约约束下非国有控股公司进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而国有控股公司没有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的结论的一个校正性补充。同时,由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因此,这个发现对重新认识债务的治理作用,特别是在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11. 房地产市场中外外部性理论的新案例和新发展

白钦先(辽宁大学)、主父海英(山东科技大学)

《我国房地产业的金融负外部性考察》,《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传统的外部性理论一直是扑朔迷离、非常模糊的。外部性又称“溢出效应”,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的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为社会带来了福利,得不到报酬,造成了损失也无需付费,总之,损益与自己无关。外部性一般分为正外部性(有益的)和负外部性(有害的)。正外部性使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即对社会有贡献,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蜜蜂在果树上采花粉,果树丰收了,果农是不需要向蜂农付费的;负外部性使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即损公而肥私。比如吸二手烟对被动吸烟者造成了伤害,但是对吸烟者却也无奈何。

经典理论的生命力的确是常青的，因为它将自己的根扎在了经济生活之中，该理论研究的先驱者们在研究蜜蜂、果园、灯塔、噪声、污染的外部性时，可能无法想象今天在房地产业身上也产生了“外部性”，这真算得上是外部性理论的新案例和新发展。

毋庸置疑，房地产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有明显的金融属性，其虚拟化易导致泡沫化。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长期以来只涨不跌，投机资本持续增加，房价远高于与之对应的实体价格，对此，愉快的 GDP 和利益获得者早已无法掩饰其外溢的令整个社会无法承担的负效应了。可以说，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高房价的获益小于其带来的社会成本，其经济绩效是局部、片面的，而社会成本却是全局性的，这就是房地产业金融负外部性效应。

房地产为整个社会惹下的麻烦，最终由社会来承担的主要有：对通货膨胀的拉动——房价上涨引发建材价格上扬，可能会导致整个物价水平的上扬；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收益反差导致社会资本追逐于房地产炒作而游离于本业，弃主业重副业，对实体经济产生“抽血效应”；侵占耕地的代际成本——地方政府出让土地以增加财政收入是一种二代人被掠夺的窘境；银行危机——金融机构在泡沫膨胀过程中往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泡沫破灭时却会成为主要受害者；伦理代价、社会不稳定等——房地产商的寻租行为造成的灰色社会成本、房地产业的“财富神话”对劳动致富的基本价值观、择业观、择偶观的冲击，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更是激发阶层矛盾，引发不稳定因素的导火索。这些都是社会福利的纯损失。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房地产是有正外部性的，那就是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带动了近六十个产业的发展）和房价上升的“财富效应”。其实房地产业投资额只是建安工程投资额的 30% 左右，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可以是建筑业而不能是房地产业。根据测算，1998-2008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只为 1.95% 而已。至于我们期盼的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财富效应也基本上是落空的，由于投资性购房过多，已使当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把住房的一般消费者挤出了市场之外。“财富效应”所期望的通过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刺激消费显然已失去了现实基础。

泡沫就是泡沫，它的本质是不可持续性，而在此痛苦的结果出现之前，采取主动会更主动。很多人顾虑打压房价会不会造成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经济拉下水？这一点中国的情况是比较乐观的，中国人民的高储蓄率习惯使得我们的购房行为绝不像美国人那么不靠谱（美国房地产危机源于低储蓄率背景下居民、部门的过度负债），而且中国的高首付和低贷款率也是一个保证。

从理论上说，外部性极其强烈时必然催生新的制度。按照“Umberk 模型”（1981）的说法，一旦某个人（某个集体）具有打破传统或习俗的勇气和力量，并且从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成本，于是所有财产的分配将在这种力量和暴力的基础上得到重新的分配。当外部性实施者对外部性承受者带来的外部性十分剧烈时，承受者降低外部性的勇气十分强烈。为此，政府必须坚持调控房价。

## 12.变化始于人口

徐盛发 巴曙松（东北大学）

《从资产负债表角度考察人口结构的宏观含义》，《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2004年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2010年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2015年中国将迎来“人口红利”关闭的时间窗口；2015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峰值；203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这是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五个阶段性拐点，而有关中国经济周期与趋势的一些重大转变也将始于这些人口变化。

第一，“人口红利”的逐步关闭将使中国经济增长中枢下移、通胀中枢上移。这表现在：

(1) 劳动力供给紧张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供给端冲击导致通胀中枢上移。(2)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资本形成不足、创新能力下降，劳动、资本、技术三重冲击导致增长中枢下移。(3) 人口红利终结导致储蓄率下降，资本形成下降，从而使得投资增速下滑。(4) 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有利于消费兴起。储蓄下降，消费上升，高贸易顺差难以持续。

第二，中国目前处于两大人口拐点之间，经济增长的周期驱动力面临转换。中国经济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即将到达人口红利拐点，目前处于两大人口拐点之间，现有增长模式仍将持续，未来风险必须加以前瞻性应对。这体现在：(1) 投资方面，刘易斯拐点后，储蓄率变化并不明显，经济依然依靠投资拉动；人口红利拐点后，储蓄率下降、资金成本上升，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2) 消费方面，刘易斯拐点后，由于消费惯性影响，消费上升缓慢；人口红利拐点后，净消费人口占比上升，净生产人口占比下降，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3) 出口方面，刘易斯拐点后，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将冲击制造业出口；人口红利拐点后，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高顺差难以长期持续。

第三，从人口变化的趋势来看，M2同比增速也将在未来出现系统性下降，而内外因素共振将加速M2/GDP的拐点到来。从横向增速看，在过去大部分年份我国M2的增速明显高于名义GDP的增速，并且明显高于美国与欧元区货币供应量增速。从存量规模看，2010年底，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达到11万亿美元，居世界各大经济体的首位。如果以M2为标准，人民币现在已经超过日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币。如果计算M2/GDP的比值（其中M2取2010年底数据，GDP采用2010年数据），我国的M2/GDP为1.82，而美国仅为0.61，印度为0.79，巴西为0.83，俄罗斯为1.54，日本为1.63，无论与发达经济体还是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我国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都是最高。分析M2/GDP高位运行背后的原因，关键在于中国人口红利的高储蓄释放最终对应为中国的高出口、高顺差、高外汇储备，这意味着基础货币的投放，通过货币乘数最终形成M2。随着人人人口红利的逐步弱化，中国宽松的货币条件也将有所弱化。

展望未来，随着多个人口拐点的到来，中国需要克服两大陷阱：收入分配失衡的“中等

收入陷阱”和区域发展失衡的“梅佐乔诺陷阱”。为避免陷入这两大困境，中国的合理选择应当是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实现人口结构的“二次红利”，即利用变化之后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抵消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产生的不利效果，从而挖掘出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二次红利”的获得取决于大量制度建设的推进：（1）户籍制度改革的有效推进。解除人口流动的障碍，促进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真正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解放农民工的消费能力，促进消费兴起。（2）教育投入和创新体系的建设。提高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抵消工资上升压力。（3）服务业的有力开放。当前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壁垒依然较为严重，需要通过改革有力推进其开放。（4）完善社保制度安排。建立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对冲老龄化条件下居民储蓄率的降低，形成新的储蓄来源。（5）金融体系的改革。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顺畅进行，以保证东部地区通过资本投入获得劳动生产率提高过程的实现，同时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 世界经济研究

### 13. 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 APEC 地区经济增长

刘玉海（南开大学）、武 鹏（中国社会科学院）

《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 APEC 地区经济增长——基于 SBM-Undesirable 和 Meta-frontier 模型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1 年第 6 期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来源于不可再生的石化燃料等能源消耗，而能源则是过去三百年世界各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必要投入之一。换言之，在能源使用技术和消费结构均不会发生快速转变的情形下，一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必将需要消耗更多的石化能源，这意味着将排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2007）指出，虽然目前仅有 38 个工业化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一减排期承担二氧化碳减量排放的必要义务，但是将减排责任扩展到所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或地区将是未来的整体发展趋势，亦即可以预期世界各国都将承担程度不一的减排责任。成立于 1989 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包括了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地区，其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已占到全球总量的 57%，但是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占到了全球总量的大约 60%，因而 APEC 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理应承担责无旁贷的义务。虽然一国承诺温室气体减排将不可避免地对其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是节约能源和减排气体的根本途径却也依赖于一国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在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下衡量 APEC 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并据此探寻效率改善的策略，理应成为研究 APEC 各国在积极承担减排义务的同时又能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关注焦点所在。

近年来，国内外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包含温室气体排放等非合意性产出的效率和生产率测算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是这些文献却忽视了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的松弛性问题，都将导致其度量的效率值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误。此外，在效率和生产率的跨国比较中，由于各国在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制度等方面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就导致各国所面对的生产边界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此时，倘若继续使用总体样本资料进行经济增长效率的评估，将无法准确地衡量各国真实的生产效率。有鉴于此，我们采用能够处理非合意性产出和投入产出松弛性问题的 SBM-Undesirable 模型以及能够同时构建共同边界和群组边界的 Meta-frontier 生产函数这一综合分析框架，在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双重约束条件下，对 APEC17 个成员 1980-2007 年间的经济增长效率进行了测算，并进而对双重约束下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效率测算结果显示，在 APEC 经济体中，除了发展中国家群组之外，发达国家群组和东亚新兴经济体群组中均有部分国家在个别年份位于潜在最佳生产技术的共同边界上。从各群组的共同技术效率（MTE）和共同技术比率（MTR）

平均值来看,三大群组从高到低的排序均依次为发达国家、东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表明不同国家群组之间确实存在生产技术水平上的差异,而且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群组,其生产技术水平相应地越高。

面板估计结果表明,人均 GDP、工业化水平、劳均资本、人口密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对能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 APEC 地区共同技术效率与三大群组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呈现出不尽相同的表现。具体而言,人均 GDP 与技术效率之间关系的计量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APEC 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追赶效应。工业化水平的实证结果则反映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超过某一转折点时,其生产效率将呈现出加快发展的态势,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快其工业化进程可以较快地提高其经济增长效率。劳均资本与技术效率之间存在一种显著的“U 型”关系,这表明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将要并且应该更加重视资本的投入质量,从而对包含环保效果的资本投入表现出更大的偏好,这将对其生产效率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地区人口密度与技术效率之间关系的计量结果则表明,对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地区人口密度增加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尚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通过适度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可以有效获取城市化所带来的集聚经济效益。对外开放程度与技术效率之间关系的实证结果显示,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程度越高,将吸引越多的境外资本入驻从事生产活动,而这在强调经济发展而环保意识相对淡薄的情况下,将会导致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从而对生产效率造成不利的影响,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强调招商引资数量的同时应该逐步重视其引资质量的提高。计量结果还显示,《气候公约》的签署对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冲击,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则相对不明显。

#### 14. 发展中国家永远不承担强制减排责任吗?

史亚东(南开大学)

《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差异分析——以人均消费作为减排门限的实证检验》,《经济评论》2011 年第 6 期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全球面临的最为严重和棘手的国际环境问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启了减少二氧化碳等主要温室气体的行动。然而,在如何分担减排责任方面各国却一直争论不休。一个主要的争论是,当前的国际气候协议——《京都议定书》只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义务,却允许发展中国家进行自愿性减排。发达国家坚持发展中国家也应纳入到统一的减排行动中来,但发展中国家却认为发展是本国的第一要务,考虑历史责任等因素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减排。

国外经济学家在利用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对《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效果进行研究时发现,当设定《京都议定书》永远执行时,即假设发展中国家永远不承担减排责任时,《京都议定书》对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有限。而根据潘家华等学者提出的“人文发展”

概念，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需求也存在着“上限”的要求。因此，不管是出于使政策更加有效的目的，还是从责任分担的公平性角度，发展中国家当前不承担减排责任不意味着未来也不进行强制减排。全球碳减排责任分担需要一个进入机制，这将是解决当前国际气候合作争论不断的一个突破点。

然而，如何设定一个进入机制，或者说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各国是否应当进行强制减排呢？这需要深入挖掘各国不愿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的原因。由于二氧化碳等人为温室气体大量产生于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对一次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的消费，减少碳排放意味着减少对这些能源的使用。如果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拉动作用，那么减少对它们的消费将导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这是所有国家实施严格能源政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时最担忧的事情。

事实上，能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投入确实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一定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果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国家间的差异，或者说在某些国家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那么，这些国家就可以大胆地实施严格的能源和环境政策，而不必担忧其造成的负面效应。

考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转换行为，首先需要确定这种转换关系因何而发生，或者说当达到什么门限标准时这种转换行为才产生。根据生态足迹理论，导致环境污染的最终驱动力是消费者。在减排责任分担时，考察消费者的责任也被认为是相对生产者责任更加公平而合理责任分担标准。因此，以人均消费水平作为考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非线性转换关系的门限变量，将不仅考虑了各国发展经济的内在诉求，也同时符合责任分担的公平原则。

利用 45 个国家 1980-2007 年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当以人均消费水平作为门限变量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转换行为。并且，当人均消费水平不超过 13544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为 2005 年不变价）时，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而当人均消费超过这一水平时，这种作用的方向改变并且不再显著。这预示着这些超过门限水平的国家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更应当实施严格的能源和环境政策。从减排责任分担的角度看，可以认为这些国家应当率先实施节能减排的措施，并承担强制减排责任。另外，考察人均消费水平在门限值前后的国家名单发现，超过门限值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距离这一门限水平还有较大距离。这说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实施严格的能源政策时要格外谨慎，否则可能因为节能减排而导致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但从动态的角度看，当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均消费水平超过门限值时，也应当加入承担强制减排责任的行列。

## 理论前沿动态

### 15.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研究新进展

陈继勇 梁柱 (武汉大学), 《经济评论》2011 年第 6 期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分歧,特别是罗德里格斯和罗迪克(Rodriguez and Rodrik, 2000)在对一系列关于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文章评述后认为,大多数得到预期结论的文章要么来自于模型误设,要么是对开放度使用了错误的代理变量,而这些代理变量往往是衡量其他政策或制度的变量,这些变量本身也对经济增长具有独立的效应;并且很多模型的估计系数对控制变量敏感,即模型的估计系数并不稳健。同时,开放度的内生性问题也给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带来了较大困难。

近年来,学者们主要是从工具变量法、倍差法、配对法和其他识别方法等四个方面研究在该领域中控制贸易开放内生性的方法,重点关注新的工具变量的构造。寻找到一个好的外部工具变量能够解决双向因果、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等三个问题,然而寻找工具变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面板数据的情况下,现在大量的研究者青睐动态面板的 GMM 估计方法,该方法即是使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法通过外生的变化能够甄别因果关系,并能够显示由因及果的作用渠道。倍差法自然实验提供了一种外生的变化或冲击,这种外生的变动可以解决双向因果关系,但倍差法需要满足处理效应可忽略性的假设,以及处理组和对照组在事件发生前后具有相同的趋势。工具变量和自然实验都是依靠外生的变化或冲击来解决联立性问题,而配对法是忽略“效应的原因”而直接考察某种处理效应的结果大小。配对法常被用于微观计量,在研究宏观问题时,可能会面临样本量不够大的问题。

面板 GMM 方法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寻找外部工具变量的困难。由于外生变量比滞后内生变量能够提供更多的外生信息,因此寻找贸易开放的时变的工具变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是该领域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费尔(Feyrer, 2009)的分析量化了运输成本和全球化的其他因素在贸易促进人均收入提高方面的作用。因此,量化分析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渠道将是未来该领域研究的又一方向。

### 16. 大国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欧阳峤 (湖南商学院), 《经济评论》2011 年第 6 期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大国经济的研究经过了“提出问题、初步探索、形成热点”三个阶段。从学术意义上最早提出研究大国经济发展的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他在 1992 年出版的《新发展经济学》中指出:应该重视对发展中大国的研究,并试图探讨“大国发展的问题,包括大国的特征、大国发展的难题和大国的特殊道路”。2006 年,我国翻译出版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引发了对大国崛起的

讨论,使大国经济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近几年来国内形成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团队,如北京大学姚洋教授研究大国有赶超,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研究大国发展战略,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研究大国发展道路,湖南商学院欧阳峤教授研究大国综合优势。从总体上看,研究线索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一是大国特征和大国优势。从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化事实中揭示大国的特征,这是大国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张培刚认为发展中大国是一个既包含自然地理特征、又包含社会经济特征的综合概念。童友好认为大国经济不同于小国经济的特征在于: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国内市场潜力大;经济规模大,对世界经济影响力大;工业部门体系齐全。欧阳峤从经济方面进行了概括,认为大国经济的特征包括:国民经济体系的相对完整性、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与世界经济之间影响的双向性、经济发展的相对稳定性。有的学者从大国特征中寻求大国优势,使大国特征研究延伸为大国优势研究。张培刚认为大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及足够规模的国内市场,从而在工业化初期可能有一定的发展优势。然后,鉴于当时“亚洲四小龙”腾飞而大国发展相对缓慢的客观事实,人们普遍把目光投向大国的发展的困惑。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和“金砖国家”迅速崛起的态势,使人们看待大国的眼光发生了变化,逐步认识到大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欧阳峤从五个方面概括了“大国效应”,即市场潜力大,国内市场拉动经济增长;资源总量大,国内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经济规模大,加深国内产业分工程度;产品多样性,增强对外贸易比较优势;区域差异性,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完整性,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二是大国模式和大国战略。张培刚借鉴钱纳里·库兹涅茨等西方学者的观点,概括了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性特点,人们研究较多的是大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导致的以内需为主、外需为辅的发展模式;童友好分析了大国国内市场拉动大国经济起飞和以国内竞争代替国际竞争的作用;靖学青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大国的总需求和总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于净出口的贡献;曾剑秋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了大国内外经济循环战略;江小涓提出了“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有的学者从国家规模的角度研究相应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李由认为大国的经济规模导致了内部分工相当发达、市场结构相对完备、积累水平相对较高、产业门类相对齐全、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对外贸易依存度低等特点;李稻葵提出了大国发展战略的六个基本要素,即建立有效的统一的内部大市场,实行大国战略贸易,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实现关键产业的技术突破,有大国的经济外交和国际舆论导向。

三是大国治理和大国体制。李由研究国家规模约束下的政府管理的特征和方式,提出了大国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包括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合理规划分行政区,实行分级管理;运用产业政策调控,合理配置资源。张军、陆铭等专门研究中国的分权式治理模式,分析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的行为的关系。

综观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研究对象不够明晰。由于对大国的界定缺乏统一认识,导致研究对象过于宽泛或者过于狭窄,有的还混淆了大国与强国的界限,从

而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二是研究内容比较分散。由于具体战略的探讨较多，理论性的探讨较少，整体性的研究不够，难以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此，今后的研究将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第一，从多维的视角对大国经济进行系统研究，分析大国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各个领域的具体模式和不同层面的具体战略，形成完整的理论系统；第二，从深化的视角研究大国经济理论，分析核心原理和基本原理，构建引入规模要素的大国经济增长模型；第三，从学科的视角研究大国经济理论体系，提出理论分析的框架和范式，构建知识体系和范畴体系。

## 17. 产权保护：理解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钥匙

曾祥炎（湖南科技大学）、林木西（辽宁大学）

《中国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研究述评》，《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或许是因为存在“公共地悲剧”，也或许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一些痛楚，很多人相信明晰的私人产权能解决社会的大多数问题，甚至对“私有化”心驰神往。可是，明晰的私人产权真的就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吗？

拉美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普遍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非调控化”，其结果是这些国家陷于“拉美陷阱”中难以自拔。80年代初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都以世界银行赋予的普遍指导准则来实施改革，主要包括促进出口增长、经济私有化、贸易自由化以及市场自由化，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以福音，反而带来了不断的社会冲突，社会也因此陷入了“低收入陷阱”。90年代之后，俄罗斯、印度等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俄罗斯、印度的民间投资却比较低迷……而相反地，前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有过高速的经济增长。东亚国家在强政府模式下创造了“东亚奇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并未形成强有力的法制部门对私人产权进行充分的保护，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够完善，但中国却保持了长达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

事实证明新制度经济学所宣扬的“私有产权神话”是不准确的，模糊的产权有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要理解这一点，有必要从产权保护的角度来理解产权：政府给定（或改变）产权保护模式→激励机制发生变化→各生产要素在新的利益关系下组合生产→社会生产发生变化。相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微观分析，从产权保护角度分析产权有着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致性，因而也可以称为产权制度的宏观分析方法。在宏观分析视角下，我们可以在历史长河中找到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蛛丝马迹：在奴隶社会，农产品生产不足，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土地产权受到偏袒性保护，劳动力产权处于弱保护地位，劳动者经常被强迫劳动；到了封建社会，农产品供给不再存在严重不足，土地产权与劳动力产权趋于均等的保护是社会繁荣的重要条件，劳动者变得相对自由；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社会工业品生产严重不足，为了提高工业化水平，有必要对资本产权进行偏袒性保护，从而土地与劳动力等其他要素便处于弱保护地位，“圈地”与低工资便成了这一社会阶段的重要特点；但到了后工

业化时期,工业产品的供给日益充足,对各生产要素进行趋于均等的保护成了社会实现工业文明充分发展的制度前提。

从产权保护的视角出发,可以理解在土地集体产权虚置、农民工权益保护不足、环境与知识等生产要素产权模糊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取得奇迹般的增长。以土地产权制度为例:当中国地方政府借助低地价大搞“开发区”的时候,在西方民主制国家,像世界经合组织国家(OECD)和印度,往往需要年复一年的协商才能使不同利益集团就某块土地的使用达成一项协议。即使对于新德里申请主办2016年奥运会这样的大事,印度政府要想获得土地也是一项“马拉松式的任务”,因此长期谈判阻碍了公共和企业投资的进程。两者对工业化的推进作用差异由此可见。

但是,这种依赖政府对产权制度进行偏袒性保护取得的经济成功,相对来说只能在社会“起飞”阶段才能实现,因为这一阶段有保证资本产权利益从而促使资本形成的强烈需要。一个经济体一旦跨过这一阶段,如果继续一味地坚持对资本利益的过度保护,则会引起劳动、土地、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产权所有者的抵制,从而引发更大的经济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健全和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这正是目前困扰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入的问题,也是下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

## 18. 西方经济伦理研究中的数理方法

沈昊驹(华中师范大学)、乔洪武(武汉大学)

《西方经济伦理研究中的数理方法述评》,《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经济学“伦理不涉”越来越受批判的情况下,经济伦理学这一交叉学科越来越受重视。以肯·宾默尔(Ken Binmore)为代表的一些数理经济学家对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大量运用现代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这种当代经济学主要发展动力机制的方法,甚至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之上的实验方法对经济伦理问题进行解释和逻辑演绎推理。在宾默尔的“我们需要把道德视为一门科学去研究”的号召下,建立起了“数理伦理学”,并出现了一批由数理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组成的“数理伦理学家”。近年来,他们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伦理的文献不仅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JEL)、《美国经济评论》(AER)、《博弈论与经济行为》(GEB)等国际性经济学权威期刊上,而且对经济伦理背后的科学基础进行研究的论文还频繁见诸于《神经科学》和《神经成像》等自然科学权威期刊甚至《NATURE》和《SCIENCE》这种国际顶级的综合科学期刊上。

事实上,用数理方法研究伦理学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早就曾经尝试用严密逻辑推理的数理思维去论证伦理学问题。古希腊时代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就试图将数理秩序引进伦理领域;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就是强调用数学和逻辑演绎方法来研究伦理学的理性主义者。在笛卡尔之后,霍布斯、斯宾诺莎、埃奇沃斯等思想家都曾积极倡导构建一种如同几何学和物理学一样客观必然、

严密精确、可以操作、能够包容人类全部伦理学命题的科学的伦理学。其中将数理方法的严密性融入伦理学研究并付诸实施的主要还是斯宾诺莎，他认为只有像几何学一样，凭理性的能力由直观获得的定义和公理推论出来的知识，才是最可靠的。所以，在写作《伦理学》时，斯宾诺莎就把人的情感、欲望和思想等也视作几何学上的点、线、面，先提出定义和公理，然后再加以证明。直到今天，罗尔斯在他那部影响深远的巨著《正义论》中仍然呼吁：“我们应当努力于构建一种道德几何学：它将具有几何学的全部严密性。”

当前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和哲学家研究经济伦理问题所用的数理方法，主要是指利用数学理论作为一种分析经济伦理思想规范或范式的工具。丹尼尔·豪斯曼和迈克尔·麦克弗森曾经分析过社会选择理论和博弈论方法在道德哲学中的应用，以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代表的社会选择理论和当前流行的博弈论显然代表了道德数学的主流方法，但应用于经济伦理研究的数理方法远不止这两种方法。从一种宽泛的角度讲，这些方法具体可以包括：基础数学和统计学方法、经济数学方法、经典博弈论方法、演化博弈论方法。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又衍生出另外两种方法来：博弈实验的方法和计算机模拟仿真方法。这些数理方法主要在对公平正义、合作诚信、利他行为、幸福的计算、社会非主流情感以及对道德产生机制的研究中大量使用。

数理方法有着严密性、逻辑性和精确性的特点，在寻求伦理道德的逻辑自恰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经济伦理学研究中数理方法的普遍采用，有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方法论层面的意义。独特科学研究方法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数理伦理学把数理逻辑引入经济伦理学，对于克服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的主观主义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为经济伦理学增添了精密、严谨的科学色彩，也便利了经济伦理学者相互交换资料、验证和讨论。二是对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传统观念一直认为西方经济学中数理方法的使用与对行为主体的道德考量是不相融的，但数理伦理学的发展则表明，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也可以用数理方法。这就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打破传统不合理假设，破除行为主体价值中立的立场，为行为主体加入道德判断奠定了基础，从而也必然使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结果能更好地解释现实。三是对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意义。数理方法在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为打破神秘主义伦理规范的严重禁锢带来了一道曙光。基于数理逻辑推理的伦理学能使人对“已然”的道德法则给出“何以然”的理性解释，还能对一些未确定的道德法则给出逻辑推理的判断。因此，数理方法为经济伦理学成为一门客观、严密和精确的独立科学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自1980年创刊以来，本刊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新书评介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近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和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态势，《经济评论》适时调整和更新研究主题，强调现代经济学新的研究方法，大力扶持青年才俊；另一方面，全面落实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与国际学术刊物规范接轨的力度，不断提升《经济评论》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品位。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27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28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全国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排名第4；根据最新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在全国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期刊的文献计量学评价中，《经济评论》位居第5。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http://jer.whu.edu.cn>)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

---